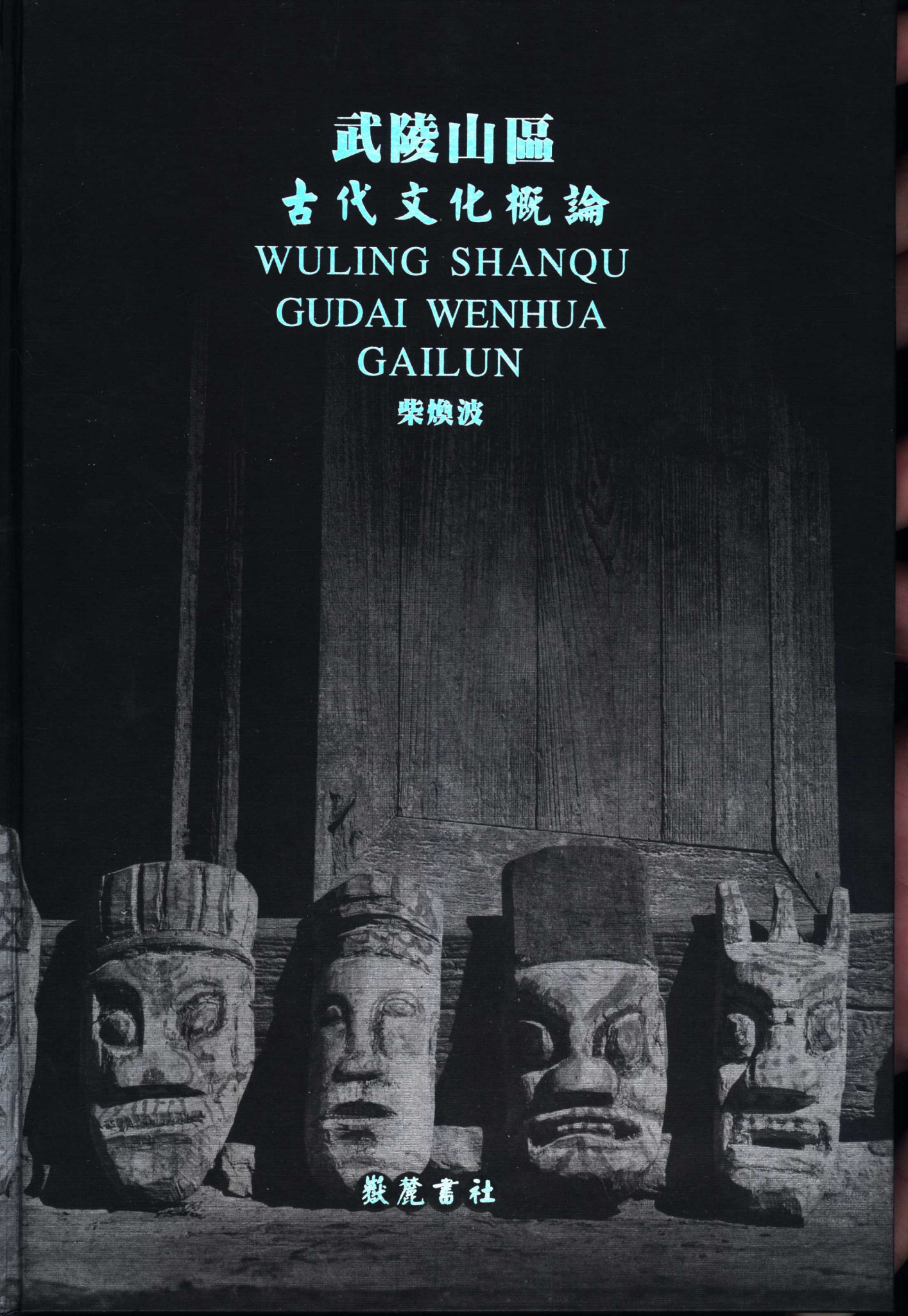


武陵山區
古代文化概論
WULING SHANQU
GUDAI WENHUA
GAILUN

柴煥波



岳麓書社

武陵山區

古代文化概論

WULING SHANQU

GUDAI WENHUA

GAILUN

柴煥波



徽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 / 柴焕波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ISBN 7-80665-481-X

I. 武... II. 柴... III. 文化史 - 研究 - 湖南省 - 古代
IV. 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907 号

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

作 者: 柴焕波

责任编辑: 管巧灵

装帧设计: 山和水工作室 刘峰 刘娟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电 话: 0731-8885616 (邮购)

邮 编: 410006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7

印 数: 1-3000

ISBN7-80665-481-X/G·392

承 印: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邮 编: 518111

电 话: 0755-846868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绪 言	001
-----------	-----

上 卷 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各民族的起源

一、武陵山区的地理概况	011
二、武陵山区周边历史发展概况	015
三、武陵山区各民族的起源与历史沿革	024
(一)武陵山区的土著先民	024
(二)土 家 族	052
(三)苗 族	066
(四)侗 族	074

下 卷 秦汉以后武陵山区的文明模式

一、中央王朝对武陵山区的开拓过程	081
(一)武陵山区的地理发现过程	081
(二)二十四史中对武陵山区的记述情况	095
(三)武陵山区建置的历史沿革	098
二、武陵山区的地方政权组织	137
三、武陵山区民间生活史	159
(一)经济生活	159
(二)社会组织	171
(三)姓氏、婚姻与家庭	180
(四)哲学思想	188
(五)宗教祭祀	191
(六)丧葬习俗	223
(七)民族建筑	241
(八)服 饰	249
(九)民 歌	253

参考文献	263
------------	-----

后 记	270
-----------	-----

绪言

1

人往往可以在瞬息之间,感受到往事的重现。当我在七千年前高庙遗址的陶器图案中,辨认出武陵山区迄今流传的古老图腾时,分明感到天地之间萦绕不散的历史氤氲。

1998年冬天,当我行舟于黄昏的酉水上,岩罅峭壁间散布着古代僚人的悬棺,而彼侧山寨的火光中,传来土家人“跳丧”仪式的鼓声。在一间农家的堂屋内,聚集了死者的族人与亲朋,满屋的纸幡、扭动的舞姿、诡谲的表情、弥漫的鼓声火光,让我感到遥远时光的重现。“五溪蛮,父母死……打鼓踏歌,亲戚宴饮舞戏……于临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弥高者以为至孝”(唐·张鷟《朝野僉载》),这一仪俗不正是这段文字的最好印证?

往事如斯,而未尝往也,历史并没有远去,凡是曾经发生过的总是会在这宇宙之间占据它的位置,并随时可以呼之欲出。

1995年秋冬,我在猛洞河畔的永顺老司城发掘了土司鼎盛时期的宫殿、墓葬。漫步在荒草离离的遗址上,我在想,从彭士愁到彭世麒这整整十几代的土司生活在何处?他们的城池、坟茔何在?还有秋风中的铜柱、夕阳下连绵的墙垣与古堡、窖藏在山谷旷野中的虎钮鐔于,残存在各族生活中的古老傩仪、梯玛、椎牛,支撑着世代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火以及触动各族人民记忆中的伤痛……所有这一切汇成了一幅古今杂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让人久久神萦梦回。

2

“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止,通称武陵山脉。”(参考文献1)

武陵山区在新石器时代,由于缺乏农业革命的条件,又缺乏盐源,没有大的原生文化。一些河谷台地上,仅见极少的来自洞庭湖区或沅水中游的一些遗址。到了商周,这一地区才有了人类密集的居住。这一地区是古代朱砂出产地,商周时代冶金业中对于汞的大量需求,使这一资源受到极大的重视,也许,这正是开发的重要契机。

这块山地最早出现在文献上的居民,是商末参加伐纣战争和之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濮人,以后史籍上又称为僚人、仡佬人。先秦时,又先后有苗蛮人、古越人、巴人进入这块土地,并一直以此为世居之地。他们介居于溪峒之间,保有疆土,自相君长,视王朝盛衰强弱,以为叛附,他们正是现代苗族、侗族、土家族的先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

当然,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

武陵山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来自内部,而来自于外部,本土民族与外来汉民族之间的矛盾贯穿了整个历史。其二是文化上的多样性,多民族共存而不融合,这种格局甚至保存到现在,这源于地理上的分散性和内部尚未产生文化统一性的需要。

武陵山区的王朝建置始于楚汉时期,但当时势力所及只是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城市,与王朝之间仅维持着松散的臣服关系,山区的绝大部分为当地土著所居住。武陵山区溪峒深险,难扰易乱,苗氛炽不可控,商贩不通,诸蛮逼境,成为历代王朝的心腹之患,封建王朝的统治、镇压与地方政权的割据、反抗,贯穿了武陵山区的整个历史。从楚平王伐濮、马援征蛮、溪州之战到清代征苗,充塞了武陵山区现存的文献与方志。

元明清时代,武陵山区与大部分西南地区一样,进入了土司统治时期。

清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大力经营,国力日渐增强,在此情况下,开始在土司统治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运动。对于武陵山区腹地的“生苗”地区,则经历了名为“开辟苗疆”,实则充满屠杀和流血的岁月,失去土地的苗民不得不一次次“变乱”、反抗,换来的则是一次次更血腥的镇压。血洗后的苗疆一片惨状,如《贵州通志》所载:“皆毁其室户,戮其丁壮,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至是杀戮什之七八或数十百寨无一人”。镇压苗民起义以后,清政府在武陵山区修筑边墙、碉卡,推行屯防制度,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苗族人民为反屯田、反碉卡封锁,进行了一次次的暴动。接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生活无着的苗民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田园荒芜,户口凋零,而更广大的各族人民在死亡线上呻吟。时势的变迁,演出了光怪陆离的历史剧,并与现代民族的记忆相交织。同时,新世界的曙光也在这黑暗中孕育、诞生,这就是武陵山区历史发展的大势。

3

以平原、大河流域为中心的原始农业文明,从很早时候起就呈现出一体化趋势,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华夏文明的基础。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地老天荒,东汉马援称之为“鸟不飞度,兽不敢临”,唐代李吉甫谓“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土著政权拥兵割据。在文化上,武陵山区处于洞庭湖区与四川盆地两个文化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它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

武陵山区自古被称为烟瘴蛮荒之地,正史中除了一些征战的记载,早期史迹渺茫无稽。黄闵《武陵记》旨趣于道教仙迹。唐宋以来的一些文人游宦的记叙,一鳞半爪,多关注于对奇风异俗的兴趣。明清以后大量的史籍、档案,则注重于对“顽苗”的征服与控制方略。最近几十年来,尽管在族别史上做了一些研究、梳理工作,但尚留下许多历史的疑团。有鉴于此,我从1995年起,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开始了湘西古文化与民族史的研究历程,本书是对这些年工作与思考的一个总结。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出土遗物,通过这些实物遗存,建立起一个个不同的文化网络。然而,这种从区系类型思想演化出来的考古学研究,只是从一个角度打量历史,它并不能涵盖“历史”这个大题目。有时候,当我看着满室的陶器架,心中总是隐隐



感到可能有大量的未被认识的信息在悄悄流失,而它们更多是在我们既有的学术规范之外。在对武陵山区古代文化的研究实践中,我努力把武陵山区看作一个整体,它的历史法则、实物遗存、文化事象看作资源,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资料出发,努力去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以恢复一个完整的文化景观。

本书在结构上无意写成一部面面俱到的地方史,而是着眼于两个主题。上篇“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各民族的起源”,在叙述武陵山区的自然、人文地理的基础上,对武陵山区上古历史进行了探索,对土家族、苗族、侗族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历时性叙述。下篇“秦汉以后武陵山区的文明模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从“中央王朝对武陵山区的开拓过程”、“武陵山区的地方政权组织”、“武陵山区民间生活史”三个角度,剖析了武陵山区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规律,展示了一幅武陵山区各民族古代生活的历史画卷。

本书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对下列问题有新的开拓。

1.通过对商周时期不二门类型一系列遗址的时空考察,结合古代文献中有关濮人的记载,指出以不二门商周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是古代濮人的考古学文化。过去在历史研究中对考古学资料的运用,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旁证,考古学本身的独立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出来。通过这一研究,在濮民族史研究领域首次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语汇。

2.对湘西北以往发掘的东周墓葬资料进行全面梳理,首次提出:过去习惯上认为的楚墓中,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和族属,它们是:以圜底内凹绳纹罐为特征的苗蛮墓;以矮粗颈壶、豆和宽格铜短剑为特征的濮人墓;以鬲或鼎敦壶为特征的楚人墓。这一研究为探索古代民族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湖南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 278 年到前 221 年秦统一全国这六十来年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反映在考古学上,则是对湖南战国晚期后段一组典型陶礼器组合性质的不同理解。这组陶礼器以细高足鼎、细颈球形腹壶、扁球形敦(或有盒)为代表。里耶麦茶基地的发掘显示,里耶与长沙以及湖南其他地区楚墓呈现出相同的规律性,反映了里耶与湖南大部分地区历史的一体化。在麦茶基地,未见到秦文化因素,湖南在战国晚期后段到秦代墓葬的主流是楚

文化因素。在里耶城址中,第二期为秦代,秦文化的因素是在秦代才进入里耶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论证。此外,通过里耶考古,加深了战国时期秦楚关系的认识,把武陵山区酉水通道曾经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历史地位,从古史中钩沉出来,而出土的大量秦代简牍,又为秦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4.对土家族地区早期历史与土家民族形成进行探索。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其底层土著居民可追溯到上古的濮人,中古的僚人,唐宋时期的仡佬人,除此之外,该地区并不存在其他抽象的土著族群。其上层贵族来源于先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外来者,从先秦巴人、汉晋强宗大姓直到元明清时代的土司,在文化上也呈现出这种多元复合的印记。本书从最新的考古成果和相关文献出发,着重对几个关键性学术问题进行了探索,如:濮人的考古学文化;仡佬人与土家族土著;巴人进入武陵山区以及虎钮鐔于;土家族聚居区的历史界线等。这一研究对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学术问题作出新的阐述。

5.根据文献、考古学资料、民族学研究成果,把秦汉以后武陵山区政权模式确认为:王朝建置—地方政权组织—村寨(峒)。其中王朝建置与考古学发现的城址、墓葬相连,地方政权组织与王朝建置的关系,在早期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当王朝力量衰弱时,这些王朝册封的地方官吏转而成为与王朝对抗的地方豪强,唐宋以后,随着王朝控制的加强,一系列军事控制性质的府州卫所的设立,这些地方政权中心就迁往更偏僻的山间盆地,这就是元代以后土司衙署之所在。村寨是山区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以后土司辖下“峒”的所在,在历史上它们往往与虎钮鐔于的出土地点联系在一起。其社会组织形式,还保留在如近代苗族“榔议”制类似的制度中。

6.考古学给民族学资料赋予了时间的深度,通过对居址、墓葬、器物的研究,揭示出一个实际存在且向前演变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古学资料也只是提供了个别文化要素的历史,因此,只有把考古学与民族学、文献结合,才可能获得一个整体的认识,并赋予考古学资料在其存活时的历史网络中的位置。此外,在民族文化的要素中,宗教祭祀是最古老、最恒定的要素。本书在研究中,尤其注重于宗教、祭祀、葬俗等这些要素的研究。



4

分散在武陵山区的许多寨落,这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溪峒”,是上古“农村公社”的基本单位。这些人民共同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外围,以防野兽破坏庄稼和邻敌侵掠。

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这里是可以过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的。

“苗獠杂处,种类甚繁,或曰三苗之裔,或曰盘瓠之遗”,“湖北川贵沿边溪峒山菁之中乃有曰玆曰玃曰獠曰猺曰獞之类,凡十数种,皆所谓蛮也。”

“诸苗蟠聚百七十四寨,氏族聚居,自成村落,亦有傍溪洞而居者,周围千数里,悬崖鸟道,丛箐栉比,岚瘴蒸郁,阴雨恒多,视诸溪洞,独称阻绝。”(光绪《湖南通志》)

汉代对南越国的征服,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以及蜀汉经营南中,都是南方地区较大的历史事件,东晋、南宋又有两次民族大迁徙,但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波及武陵山区的并不多,相对来说,这一地区要平静得多。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如果联系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晋宋时代诸华地区一次次战乱与民族大迁徙背景,的确可以作为历史来读。宋代以后,“峒”成为“羁縻州郡”所辖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峒与峒之间常以固定的山坡、河流为界线,到改土归流后,峒作为行政单位才废除。现在武陵山区一些村寨名称仍多有带“峒”字的,如“茶峒”、“昂峒”、“水扒峒”等等。

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村寨,每一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历史,如同老树吹落的种子,也有自己悲悲喜喜的故事。我就这样走着,武陵山顶的云开云合,在我眼中时而化为往事中民族的聚散,透过村落、竹篱、耕牛……我心中涌动着恢复古代社会生活的热情。我一次次自问:武陵山区的精神何在?很久以后,我才幡然醒悟,它们不在王朝的征战史中,也不在汉族的文献、方志、游记和诗文中,它们在五溪民族自己平实的生活中。这一刻,我也触摸到亘古至今的另一种历史:酉水河上秦楚之战的帆影,沅陵窑头城下的客棧,商船与集团的掠夺,苦吟的屈原或王阳明在帐下与永顺土司的应答,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片浪花,倏忽即逝。而另一种历史,年复一年的畲地翻耕、渔猎,周期性的祭祀、傩仪、椎牛、茅古斯和男女之

间常新的爱情……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历史内蕴!这是一部埋在草丛中的历史,也是考古学者眼中“文化层”的真正内容。在某个山村荒野,在某个苗族青年吹出的悠悠芦笙声音,才是这一阕武陵历史交响曲的主旋律。我想,这也是我思考和研究的出发点与最终的落脚点。在“武陵山区民间生活史”章中,我花了很大的篇幅,记叙了乡村的节令、婚丧嫁娶的仪俗、精神世界中的祭祀、宗教、葬俗、民歌以及它们反映的世代情结、生命感和生活之流,试图展现出一幅古代人民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考古、阅读、研究是我的生活方式,也是我知识与思考的源泉。所谓发现,一方面是走向田野,另一方面是不断走向自己的心斋。我力图让自己的工作透过现实社会的种种浮像,与这块土地上最本源的东西联系起来,当我做这一切时,我觉得自己已不纯粹是埋头书斋的学者,还像一个走乡窜户的手艺人,一个隔着时空的聆听者。每次来到武陵山区,总会感受到盘桓在山谷中丰富的历史内蕴,随着个人岁月的融入,越来越让我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受,我也借助这些书稿,实现我表达的愿望。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学者的我,也从自己漂浮的生涯中获得了对于土地、历史和生命诗意的更深认识。

上卷 [武陵山区]
的自然环境与各民族的起源





武陵山区 的地理概况



武陵山脉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大斜坡上,海拔从 1000 多米降至 400 多米,是地质上的燕山运动所造成的一系列褶皱山中的一支,距古海抬升约 10~14 亿年,被认为是我国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

“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止,通称武陵山脉。”(参考文献 1)

武陵山区山脉长度 420 公里,海拔 500~2000 多米,平均海拔 800 米左右,最高峰梵净山海拔 2572 米。主峰周围多是起伏较小的中山和低山,兼有山原、盆地和宽谷。武陵山以东的沅江水系,地貌为低山丘陵,河流切断较浅,起伏平缓,河流沿岸多河谷坝子。四川盆地东部的七岳山脉与武陵山脉之间,为一海拔较高的褶皱地带,农田利用价值远逊于四川盆地,向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武陵山以西的乌江流域和以北的清江流域,地貌为岩溶山原,河流切断较深,形成众多的峡谷,相对高度可达 600~800 米,但在远离河谷的山原面上,岩溶、丘陵、洼地分布较广,地面起伏一般只有 200~300 米。武陵山覆盖的地区,连绵四省市,山区四周围绕的中等切断和深切断,构成武陵山区独立的地理单元,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包括贵州东北的铜仁地区,湖南省的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的大部分,湖北省的恩施自治州和重庆市的黔江区。

武陵山区以碳酸盐与碎屑岩多次交替沉积的多溶层结构为主要特色,是我国南方岩溶塌陷最发育的地区之一。除沅水两岸,西水北岸的永顺、保靖、龙山、来凤、桑植,鄂西的唐岩河流域和黔东北一些地区为碎屑岩,地面较为完整,自然环境相对较好外,其他地区均为碳酸盐

岩。岩溶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地表土层薄而贫瘠,植被稀少,成土极慢,形成10厘米的土壤要侵蚀约3米厚的岩石,需要1~4万年的时间。另外,碳酸盐岩溶地形经过众多河流长期的冲刷,造成地面破碎、起伏很大的复杂地貌:山中有山,层峦叠嶂,溪峒相连,河谷幽深,地形崎岖,峭壁峥嵘;到处是奇峰、悬崖、峡谷、洼地、洞穴、漏斗……

武陵山区河流众多,大小河流数千条,属长江水系。主要有清江、澧水、酉水、沅水、乌江、唐岩河等。河流低洼处形成红层堆积,造成一系列小型盆地和宽谷,俗称“坝子”。这些“坝子”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良好环境,如龙山来凤盆地、召市盆地、廖家村盆地、万坪盆地、甘溪盆地、秀山盆地、恩施盆地、建始盆地、桑植盆地等。它们既是农耕经济的基础,又是人类长期开发的结果。

武陵山区的气候属亚热带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温在15℃左右,最高气温37℃,最低-5℃,无霜期3~8个月不等,雨量丰沛,年平均降水量1300~1400毫米,多雾,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从人文地理角度,全境可分为三大区域:

北部区:酉水与清江之间,为历史上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同时也是历史上苗族广泛散居之地。其中又以两大水系间的分水岭,约鹤峰县的中营、石门县的壶瓶山一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山高岭峻,少河谷台地,自然环境恶劣,文化上更多受到清江流域文化的影响,秦代属巫郡,三国、两晋、南北朝属建平郡。与峡中巴梁间的巴人是一个整体,属廪君蛮的后裔。史料中又称“建平蛮”,多次与中央王朝对抗,冉氏、田氏、向氏尤盛,大者万家,小者千户,僭称帝王,屯踞三峡,断遏水路。直到北周建德二年(573),才相继内附,设置施州。在强大的汉文化影响下,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南部为酉水与郁江、唐岩河流域,地势变低,且有一系列河谷盆地、台地、低丘,如澧水上游永顺、桑植一带,酉水流域来凤、龙山一带,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秦汉以来,被称为“武陵蛮”、“五溪蛮”、“澧中蛮”、“酉水蛮”等等,唐宋以来土家族土司,也皆集中在这一区域。

中部区:辰水与酉水之间,为历史上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地形上分为两个自然区,西北为腊尔山台地区,东南部为溪河下游区,两者之间基本上以后来的“苗疆边墙”为界。台地海拔虽700米以上,然其上小盆地甚多,且多泉塘可以灌溉,称坪、塘、冲。最著

名的有爆木营、鸭宝寨等,为历史上“生苗”的聚居区。溪河下游区山势较台地平坦,溪河两岸可作梯田,利用沅水灌溉。这一地区为古代苗蛮的中心分布区,清代称为“熟苗”区,也为汉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区(参考文献2)。

南部区:辰水以南至武陵山区的南界,为历史上侗族和一部分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以低山丘陵地貌为主,山谷形成的峒是发展稻作农业的理想场所。内部也分南、北两大侗语方言区。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舞台,地形与人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日人野口保市郎在《人文地理学概论》中说:

“山地为文化发达最落后之地。山地多倾斜,需要劳力较大,且以人类寥寂,地产贫瘠,故交通极不发达。交通不发达,使山居人民之生活,仅能自给,无暇致力于经济之发展;惟在矿物发现,从事发掘时,则穷山僻谷,往往有勃然发达成为繁荣都市者。山居生活,缺乏互相切磋之机会,故所谓山民与平原居民迥然不同。山民有特殊之风俗、习惯、气质、言语,缺乏进取精神,富于保守习性。山地因具有此种封锁特性,故在平原与他民族竞争而失败之落,往往遁亡山间,以避世乱。例如中国之苗族,为汉族所追逐,而遁居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之山地。山脉与山脉间之盆地,较之山地,面积稍广,但不及平原远甚,究不能建立大国,仅足为原始民族建立原始社会及国家而已。又山地居民,性情大抵慆悍,盖因彼等以狩猎为业,不能经营和平事业故;也因其体格强健,故性情不免过于凶悍。

“溪谷较之山地,生产价值为大。溪谷因土壤肥沃,交通便利,所施劳力较省,故农业得以发达;溪谷是山脉与山脉间之洼地,如长江沿岸之溪谷,广阔者达数十方里,狭者仅及一万方尺。狭隘之溪谷,因其土地肥沃,故面积虽小,尚能施行集约农业,或集约经济。是故溪谷之面积虽小,而经济力则甚大;建立于山地之国家及社会,须恃溪谷洼地为其孳息发达之源。总而言之,溪谷之经济价值,介乎山地与平原之间,在国家发达之某时期上,尚称适宜地域。溪谷在交通上,亦占重要位置。溪谷因地势比较平坦,劳力可施,水利可兴,使山地与平原,或平原与平原,互相连络,交通藉获便焉。故山地,或为山脉阻隔之两地间之交通,实有赖于溪谷之连络,溪谷在交通上,遂成为此等地域之门户。外敌、文化以及物资,悉经门户以入。由是观之,可知溪谷实为文化发展上不可缺少迫切要素矣。要而言之,环境对于人类文